

1978,我的高一记忆

□赵子清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也拂过了赣南的层峦叠嶂。这一年,我有幸成为寻乌县首批重点中学的学生,“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让我看见了山外广阔的世界。

初入县中

1978年9月1日,天刚破晓,13岁的我跟着父亲,第一次离开南桥公社车头大队,前往寻乌县城。晨雾朦胧,几声犬吠为我们送行。在村口的公路边,我们搭上了从留车开往县城的班车。车子在崎岖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多钟头,将我带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寻乌县城。

攥着浸了汗的录取通知书,我迈入了寻乌中学的大门。这所全县唯一的省属重点中学,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而言,无异于是通往美好未来的神圣殿堂。当时,寻乌县响应国家恢复高考的号召,首次集中全县力量办重点高中,从各公社选拔学习尖子生。我们那届高一招了3个重点班,150名新生,人人肩上都是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

清苦校园

高一年级设在老校区“对面窝”,一个三面环山的独立院落。院里一棵高大的苦楝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巨伞。环境虽然清幽,生活却不便,每日三餐需往返主校区食堂,爬500米长的陡坡,一刻多钟的路程。

我们的教室是赣南常见的客家围屋式平房,白灰墙青瓦顶,50张课桌挤在6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趣的是房梁柱子间有燕子筑巢,每到春夏时节,小燕子叽叽喳喳地叫,为埋头苦读的课堂增添了几分生机。

宿舍紧挨在小院西边。往下走几十步石阶,有一口老井,井水清浅,可以用绳子拴着木桶打水。井沿的青石被时间磨得光滑发亮,默默见证着岁月的痕迹。山里虫子多,夜里常常有蜈蚣钻进被窝,把人惊出一身冷汗。

公用厕所离宿舍很远,夜里上厕所需要鼓起勇气。早上洗脸刷牙要排队从井里打水,冬天井水冰凉刺骨;傍晚挤在水龙头前冲洗,水花四溅中洋溢着少年的活力。

生活条件艰苦。冬天冷风从教室的砖缝隙里灌进来,冻得我们直跺脚;夏天又闷热难耐,汗珠滴在作业本上,常常洇开一片墨迹。宿舍是大通铺,一间平房里挤着30个人,砖头砌的台上铺一层稻草就算床铺了。每个人都自己带着铺盖卷、搪瓷脸盆

和铝饭盒,这些简单的行囊,装载着我们改变命运的梦想。

食堂在主操场东边。主食是米饭,菜肴很简单,最常见的是水煮南瓜,还有咸菜、豆芽等,荤菜很少见,大家家里都不宽裕。蒸饭用自带的铝饭盒,按班级编号放进大蒸笼。开饭时蒸汽弥漫,蒸饭的铝盒、打菜的搪瓷碗,碗筷碰撞,一片叮当作响,是食堂特有的背景音乐。

良师引路

我们班集中了全县前五十名的尖子生,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长洪来自江西万载,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儒雅温和,教育有方。开学不久,他就让我担任班长。一个月后班干部选举,我在他的支持下当选团支部书记。期中考试后,他又推荐我任学校学生会主席。

1978年11月,学校举办全校作文大赛。在陈老师的鼓励指导下,我投稿参赛,竟获高中组第一名。这份荣誉如一剂强心针,极大增强了我的信心。此后,我的作文常被陈老师选作范文讲评。最令我激动的,是每两周一次的作文课,他经常将我的作文逐字逐句解析,哪里写得好,哪里可以更精练,还让我把作文工整抄写,贴在教室门口供同学参阅。这些贴在墙上的方格稿纸,在晨光在夕阳里轻轻飘动,成了我高一生活最明亮、最温暖的画面。

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老师们的模样:数学老师彭佛治讲课细致入微;物理老师杨钧陆说话风趣幽默;化学老师赖家尧带着浓浓的乡音;英语老师潘作体虽然年纪大了,但教得特别认真;政治老师刘承训温厚真诚,后来当了县教育局局长。

历史老师徐生昌是广东梅州人,1958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他学问深厚,讲课细致生动,深受学生喜爱。我至今记得他讲“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时的情景——说到马克思出生,他突然抬手在空中比划:“1818年5月5日,马克思一出生,就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打得资本家呜呜叫!”这生动比喻引得全班发笑,也让1818年5月5日这个日子深深印在我心里。徐老师还擅刻钢板,许多复习提纲和试卷都是他用铁笔在蜡纸上笔一划刻就,再油印而成。那些字迹工整、散着墨香的纸张,凝聚着他无数个夜晚的心血。

那时的课堂,老师们凭着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写写讲讲。教具很简陋,三角板、地球仪都算是稀罕物。实验课更少,没有专门的实验室,老师做演示实验时,我们都得伸长脖子仔细观看。

古城墙上玉兰香

□廖晓梅

四十年前,我刚走出大学校门,迈着年轻的步伐,进入了这所中等师范学校——江西省龙南师范学校任教。当时宿舍就在那城墙上,算是二楼。

这古城墙据说修筑于明代,是本地老县城的城墙,还有古城门、城门楼,这些均由厚实的砖块垒成,春夏之际,砖缝间长满了青苔,就像城墙的胡须与毛发。这城墙有近百米长,都在校园内。学校在城墙上建有几间宿舍,每间约十平方米,配有必需的家具,简陋而实用。

宿舍前面是两栋古朴的教学楼,空地上种有柚子树等。在我的宿舍前,有一株玉兰树很特别。这玉兰树高过宿舍房顶,枝繁叶茂,亭亭玉立,绿绿的叶子有巴掌大,有枝条伸到我住的宿舍门前。我常站在门口凝视它,它也向我微笑点头,相对无言却默契相守。每年的四五月份,玉兰树含苞的花蕾,如同美女伸出的兰花指,羞涩俏皮,花开后又清香袭人,让人心醉。

城墙背后是运动场,三百米跑道,里面是自然草皮。运动场与城墙相连之处的水沟,平时是干涸的,一到春夏之交,积水的水沟就成了青蛙的欢乐

谷,阵阵蛙鸣传得很远,睡梦里也能听到,恍然间有梦回故乡之感。运动场上,每到下午课后,是学生们矫健身影的汇聚场所,也是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们的快乐之地。和学生们一起,足球、排球,球球都打,跑步、散步,步步向前。黄昏之时,汗流浹背,洗澡、吃饭,日子倒也充实快乐。

早上天刚亮,起床铃声响起,我赶紧跑到学生宿舍,催促他们起床,或许睡眼蒙眬,但一样拉起全班队伍,在操场里跑步,有时候也带学生跑街道,有大环城、小环城之分。跑步后是早读、早餐、上课,晚饭后是晚自习,每天排得满满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师生,大多是农村来的孩子,其中女生占三分之一,属于各县中考的优生,当时毕业后都分配到乡村小学任教。对不少农家孩子来说,这也是命运的改变。他们衣着简朴,绿军装、夹克衫,就是最时尚的了。他们脸色偏黑,显然是长期劳动的结果。他们额头光洁,但大多目光瑟缩,有自卑感。好在自觉性强,功底好,且勤奋刻苦,学什么都容易上手。在柚子花的馥郁、玉兰花的清雅中,我与他们一起练书

同窗共勉

班上的努力学习的氛围浓得化不开,同学们都自觉地把心思钉在书本上。作为班里的团支书,发展新团员是一项重要工作。我们班50人,初中入团的约一半,剩下的二十多位,我积极动员、介绍,后来大部分都加入了共青团。

高一下学期末,文理分科摆在每人面前。班会上,班主任陈老师细致地为大家分析利弊,特别强调要认清自身长处,鼓励文科好的同学勇敢选文科。那时社会上重理轻文思想严重,大多数同学欲报理科。陈老师以我和学习委员曾进胜为例,指着我说:“子清作文好,文科成绩突出,该报文。”又指着曾进胜:“进胜理科拔尖,该报理。”曾进胜当时睡我对面下铺,学习极为刻苦。次年高考,他果然应届考入江西医学院。

1979年的高考,徐生昌老师所带的高二(4)班创下寻乌中学空前佳绩;林翰章、沙渝晨两人考入北京大学,曾海波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林宏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这份成绩,如一声惊雷,极大鼓舞了全校文科生,也为徐老师赢得由衷敬佩。

当时,国家允许成绩优异者提前高考,我的文科成绩引起了徐老师的注意。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了一段特殊学习:放学后去他家借高二教材,书中常夹着他手写的批注。遇到难题时,他会放下工作耐心给我讲解。最难忘的是,他安排我参加高二毕业统考,我竟在高二(4)班排名第二十二,这结果令徐老师很是欣慰。可惜不久,高考报名前省教育厅忽发通知,禁止非毕业班学生报考。这消息如一盆冷水浇灭我的热情,但徐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机会总会有,重要的是保持学习热情。”这简单话语让我在失落中重找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坚定选文科的仅四人:我、古艳红、陈石松、凌奕忠。欣慰的是,第二年高考我们都考上大学。而一些原选理科的同学因成绩未达,后来“回炉”重读文科,也在1981年圆大学梦。

其实,那时人人学习都很刻苦,几年后,绝大多数人考上了大学,二三十年后,大家在各自领域都有一定的建树。同学中,罗国添、潘钢、黄金星与我最有缘。入学初宿舍紧张,我与国添曾共挤一铺,后来发现我们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此后更成为同事、同乡。潘钢是班上年岁最小的,1965年生,他1981年考入江西医学院,毕业后分配至赣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后比我早两年赴深圳,在龙岗中心医院工作。在深圳,我们成了来往最密的老同学。

时光飞逝,高一那段艰苦充实的岁月,已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每每回首,感慨万千:我们是幸运的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那条通往山外的路,不仅让我们走出了大山,更让我们成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法、一起练唱歌、一起漫步书海,陪伴他们在玉兰树旁边成长。

在玉兰花再开的时候,学生们神态自信,青春朝气让人欣喜。周末或节假日,一大帮人步行到摇头桥、玉石岩、桃江等地游玩,更远的则到小武当山、东坑深山等地远足。在旷野处、山顶上,纵览满眼的绿色,吹着山风,听着松涛,闻着花香,放肆地大喊,叫停了行云,惊飞了鸟雀。这时候,师生如同兄弟姐妹一般,一起享受这青春的蓬勃朝气。

那时候,看电影是最普通的娱乐活动。学校每周组织看电影,还把看电影当作对班集体的奖励。此时,路遥的小说《人生》改编的电影,正在热映。学生们说,老师,能否给我们讲讲《人生》,我立马答应,精心准备后开讲。那天,学生挤满了整个会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激情昂扬,谈了对小说的解读,对生活的体验。

玉兰花开了又开,古城墙依旧沧桑斑驳。三年中,我住在古城墙上,与少年学子相处,潜心于读书与教书,收获人生的酸甜苦辣。三年后,我离开了这所学校,回到了家乡。叶绿叶黄,花开花落,转眼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少年学子们,如今在各行各业都有出彩的表现,我也不经意间和这些学生过了一生的好朋友。

现在,这所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但那三年间的一颦一笑、一喜一忧,无数次出现在梦里。这段明代古城墙还在吗,是否沧桑依然? 那株亭亭玉立的玉兰树还好吗,是否花香依旧?

爱是最好的教育

□谢潮洲

上周一,正好是九月一日开学的日子,我和妻子一起,把儿子送去了幼儿园。上一次送小孩去幼儿园读书,还是在8年前,那时女儿三岁,也刚好可以读幼儿园了。

不出所料,当我们把儿子送进教室离开的时候,他大声地哭喊要爸爸要妈妈,想跟着我们回家。最后,只能由园里的老师把他拉住,抱进了教室。在教室外走廊的尽头,他还能听到儿子的哭声,我和妻子心有不忍,但又不愿离开。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种本能,我自己也一直在享受着父母对我无私的爱。不管年龄多大,我们在父母眼中都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父母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教会孩子所有的东西,比如做人做事的准则、社会生存的技能,等等,而这些,学校是最好的学习地方。因为,学校里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倾注一生,用心浇灌着祖国的花朵。

一个好的老师,往往能够改变人的一生。回顾我自己的成长岁月,也是深受老师的关心和影响。在我的记忆中,也有一个好老师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我读初一时的班主任,他姓何,我一直都叫他何老师。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当年的往事,就如昨天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

我是个农村娃,小时候,家在乡下山沟沟的村子里。我的父母很重视教育,咬牙借钱也要供我读书,小学毕业后,更是把我送到当时县城最好的中学就读。说实话,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县城,也没有坐过班车。所以,刚到县城读书时,既对新学校感到兴奋,又偶尔缺乏归属感。因为当时我们都是住校的,不像县城的学生,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见到父母。我和其他乡下来的孩子一样,一般要到五一、中秋、国庆和寒暑假,才会坐班车回老家,这样,可以省去不少车费。

何老师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对班上的每个学生,都视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包容他们、鼓励他们。在此略举二三事,都是和我及何老师有关的,从中可以看到何老师教育学生的方式方法。

第一件事是“钥匙风波”。当时我负责保管班上课室的钥匙,每天早自习之前,我都要提前去开门。前面说了,因我家在乡下,周末都在学校不回家,所以要开门时随时可以找到我。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班主任安排我保管钥匙。

有一天早晨,我照例去教室开门,可是,到了教室门口,却发现钥匙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眼看早读时间马上就到了,等同学们都来了却没门进,那不是耽误大事吗?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也到校园里自己去过的每个角落寻了一遍,还回到寝室翻箱倒柜找了很久,终究是没有找到那把钥匙。完了,这下完了!我只能提心吊胆地去和老师报告情况,等着挨他的批评,心里紧张得直怦怦跳。可是,我所担心的情景并没有发生。何老师很平静地说:“哦,你自己房间的钥匙也丢了是吗?”我说没有,只丢了教室的。他接着说:“那就好,你自己的没丢就好,教室的丢了没关系,别担心,以后小心一点就行了,老师这里还有备用的,下次我再叫人配一把。”那一刻,我内心涌过一股清流,感觉特别温暖。

第二件事是“宿舍搬家”。初中读的那个学校,当年刚创办,我也是第一届学生。当时学校还在建设中,宿舍也不够住,所以有部分学生被暂时安排在一公里外的一个工业小区厂房宿舍里住。我也住工业小区厂房宿舍,每天走路往返于学校和住地,确实颇为不便。过了几个月,新宿舍建好了,原来住在工业小区厂房的学生,都接到通知可以去学校新宿舍住了,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

那天中午,我也动手搬家了。我用的是家里带的木箱子,很笨重。我把衣服鞋袜和书本等东西塞进去,装了满满的几箱。那天,气温非常高,火辣辣的太阳,把地面晒得热浪滚滚。我背着箱子,走一会儿,停一会儿。因为我那时才十多岁,力气小,加上箱子实在太重了,所以,一公里的路程对我来说也是很远的。就在我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班主任何老师,他骑着一辆摩托车,正好去学校路过这里。他看到我搬箱子力不从心的样子,就停下来,对我说:“你把箱子放到我摩托车上来,我帮你载到学校去,等下你去学校门口拿。”说着,他用一根绳子,把我的箱子绑在他的摩托车后座上,往学校方向开去了。当时,我心里有一个“感谢”想对何老师说。

第三件事是“励志对联”。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每周有一节班会课,每次班会课开始前,何老师都有一个“固定节目”,那就是叫我们练字十分钟。他会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一句名言警句,然后给我们讲解这句话的意思,再叫我们对着抄写几遍,写完还要交给他看。

何老师每次写的句子都特别经典,特别励志。就拿第一次班会课来说吧,他给我们写的是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他说这副对联是蒲松龄写的,项羽破釜沉舟、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挫折和困难,都不要放弃。只要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第二次班会课,何老师又给我们写:“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提醒我们,做人要有恒心,学习贵在坚持,不能时冷时热。往后的每次班会课练字课,他都会送我们“金句”。通过听何老师讲这些励志名言警句,我深受鼓舞,感觉有无穷的力量在推动我更加奋发努力。其实,大部分孩子,都是心怀梦想的,如果有一个好老师,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和鼓励他们,孩子们追逐梦想的动力会更加强大,方向和意志也会更加坚定。

我很庆幸,自己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像何老师一样的好老师。我也期盼,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也能遇到很多好老师,让他崇德向善、勇于逐梦、快乐成长。

不管什么样的孩子,对父母而言,对教师而言,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鼓励与赞赏。

教师节到了,又想起了我敬爱的何老师,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一堂室外英语课

□温圣巍

记得,大学毕业那年,学校为学生安排三个月的英语教学实习,我被分到一所农村初中跟班教学。初出茅庐,热血奔放,总觉得应该把师范学院里学的那些“前沿教学法”好好用起来。

这不,正是烂漫的春天,窗外的油菜花黄得晃眼,操场边的柳树抽着新芽,我突然冒出个念头:把课堂搬到室外去!于是,我向年级教研组组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来一堂教改实验课,理由是我授课的内容是有关“春天”的英语句型,现在把课堂搬出教室,到大自然中去教学,效果应该会不错。

教研组长按着教案本沉吟半天:“想法是好,可六十多个孩子,搬到操场边的坡地上,磕了碰了咋办?”我拍着胸脯保证:“分小组,每组选个小组长盯

着;提前画好活动范围,就圈在教学楼前那片小树林里,离教室不远。”或许是“教改”两个字的分量,或许是我眼里的热切,组长最终点了头。

那天,我提前把写好的“tree”“grass”“flower”的卡片藏在树杈上、压在石头下,甚至有张“bird”被我系在了迎春花的枝条上。学生分成六组,每组领了任务单,他们像撒欢的小鹿冲进树林。有个扎羊角辫的女生举着找到的“flower”卡片,蹦跳着朝我喊:“老师!这个我认识,跟课本上的图片一样!”戴眼镜的男生蹲在

草丛里扒拉半天,举着沾了草屑的“grass”跑过来,急着问发音。

教研组的六位英语老师现场观摩教学,有位老师笑着跟我摆摆手:“你看那几个平时上课走神的,这会儿眼睛亮得很。”教研组长在一旁记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集中讲解时,我指着近处的桃树问:“What’s this?”学生们齐声答“tree”,他们的声音里带着跑跳后的喘息,却比在教室里洪亮得多。

第二天,校长找我,我原以为教改课成功必有褒奖,谁知一进门,校长大发雷霆:“破坏组织纪律,打乱正常教学秩序。我们是农村学校,农村学校有农村的教学方法。万一学生出了事,学生安全谁负责?”校长说得有道理,快乐教学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安全环境和管理土壤,是难以生存的。

不过,我始终认为,教师应该把学生看成一盏有待点亮的灯,不能总把学生看成一个有待装满水的杯子。一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应注重开拓学生的思维,点亮他们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创造力。